

一九三〇年代普羅世界語運動的 文學與文化 ——以莊松林的民間文學實踐為例

呂美親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中文摘要

本論文考察民間文學作家莊松林自1931年至1935年之間，如何參與「普羅世界語運動」及新興宗教「大本教」(Oomoto)的世界語普及運動，藉以討論當時知識青年在「轉向」文化運動的摸索之時，為何選擇以世界語作為其文化實踐之道，以及其背後的可能意涵。莊松林在世界語運動上的嘗試與實踐，可謂具有反體制性格的馬克思主義，與具跨域性格並追求人類和平的宗教思想，在這位地方知識青年身上連結與複合的表徵。尤其他的第一篇民間文學作品，即是以世界語寫成並發表於《*La Verda Insulo*》(綠島)中的台灣童話〈*La Malsaga Tigro*〉(戇虎)。從莊松林的實踐軌跡來看，「普羅世界語運動」不只是其在一九三〇年代的民間文學實踐上一個起點意義，更可視為一位地方性的左翼青年在最黑暗的時期中，為了在文化運動方面有所突破，而試著以「本土」之姿邁向「世界」的實踐過程。

關鍵詞：普羅世界語運動、大本教、民間文學、台灣童話、《*La Verda Insulo*》
(綠島)

1930's Taiwan Proletariat Esperanto Movement Connected to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Aspects: A Study on Chuang Song-lin's Folk Literary Works

Lī, Bī-Chhi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aiwan Cultur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thesis investigates how Chuang Song-lin (莊松林), a folk literature writer, participated in the “Proletariat Esperanto Movement” and Esperanto popularization movement of the new religion “Oomoto” during the time from 1931 to 1935, proposing discussion about why intellectual youths would choose Esperanto as the way of cultural practice and its implications behind it while “Tenkō” (changing direction) to the exploration of cultural movement.

Chuang Song-lin's attempts and practice in the Esperanto movement, or Marxism with so-called anti-system character and a religious though with cross-domain personality and the pursuit of human peace can be regarded as a symbol of connection and combination from this local intellectual youth. In particular, Chuang Song-lin's first folk literature was the Taiwanese fairy tale “La Malsaĝa Tigro” (戇虎) written in Esperanto and published in “*La Verda Insulo*” (綠島). Judging from Chuang Song-

lin's practice track, not only was the "Proletariat Esperanto Movement" a starting point for the practice of folk literature in the 1930s, but it could also be seen as a practice process from "local" to "world" made by a local left-wing youth who managed a breakthrough in cultural movement in the darkest time.

Key words: Proletariat Esperanto Movement, Oomoto, folk literature, Taiwan fairy tale, "*La Verda Insulo*"

一九三〇年代普羅世界語運動的 文學與文化—— 以莊松林的民間文學實踐為例

一、前言：世界語運動的左翼思想與宗教背景

民間文學家莊松林（1910-1974），曾以筆名朱鋒發表許多文學作品，另有朱烽、峰君、嚴純昆、進二、尚未央、KK、CH、赤嵌樓客、牛八庄、豬八戒、嚴光森、己酉生、圓通子等筆名。莊松林曾參與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民眾黨，以及台南赤崁勞動青年會（台灣民眾黨系統組織）、台灣勞動者總聯盟台南支部等組織，積極參社會運動¹。而其自一九三〇年代後半開始致力於民間文學寫作，一九四〇年代以降乃至戰後則投入語言、民俗等相關研究，但莊松林作為「世界語者」且積極參與世界語運動的過往，則較少為人知。

筆者自 2010 年以後陸續於日本找到諸多台灣世界語運動的史料，也在 2016 年的博論〈日本統治下における台湾エスペラント運動研究〉中考察出莊松林曾在 1932 年以「S. S.」之名於台北刊行的《*Informe de F.E.S.*》（台灣世界語學會通訊）發表〈エスペラントをかく視る〉（世界語如是觀）²；並在 1934 年以「So-Ŝjo-Lin」之名於台南發行的《*La Verda Insulo*》（綠島）中發表台灣童話〈La Malsaĝa Tigo〉（鬚虎，Gōng-hóo）³。回顧世界語在台灣的發展歷史，莊松林作為世界語

¹ 鄭喜夫，〈莊松林先生年譜〉，《台灣風物》25 卷 2 期（1975 年 6 月），頁 5、9-11。

² S. S.，〈エスペラントをかく視る〉，《*Informe de F.E.S.*》第 2 號（1932 年 6 月），頁 13-15。

³ So-Ŝjo-Lin，〈La Malsaĝa Tigo〉，《*La Verda Insulo*》第 2 號（1934 年 7 月），頁 10-12。王

者的實踐並非偶然，其背後的思想可謂同時兼具國際化視野與台灣本土的主體性建構之內涵。限於篇幅，以下僅將台灣的世界語運動簡要介紹，接著就進行本論文的分析。

三井物產社員兒玉四郎自日本內地赴任台北支社後，於 1913 年發行《*Esperanta Libreto*》（世界語小冊子），同年 9 月於龍山寺開設講習會，正式展開在殖民地台灣的世界語運動。運動曾停止一段時間，但台灣人蘇璧輝、連溫卿於 1919 年後半成立「台湾エスペラント学会」（台灣世界語學會）並發行《*La Verda Ombro*》（綠蔭），重新在台灣推廣世界語。然而，也因學會的左翼色彩愈趨濃厚而受到總督府的警戒，造成多數在台日本人會員出走並組成「台北エスペラント会」（台北世界語會），且另發行《*La Formoso*》（台灣）雜誌，使得組織分裂並展開不同路線的運動⁴。

一九三〇年代以降的台灣社會運動、政治運動受到極大挫敗，許多知識分子轉向文化運動的實踐。同時期，日本內地的左翼世界語者之間也興起「普羅世界語運動」，台灣方面亦隨即在 1931 年的第一屆「台灣世界語大會」中設置「普羅世界語分科會」，揭起台灣的普羅世界語運動之旗。而《*Informo de F.E.S.*》即是曾因左傾而分裂並停止活動的「台灣世界語學會」，為了重啟運動所發行的刊物。另一方面，在當時日本社會中極具影響力的新興宗教「大本教」（Oomoto），自 1919 年即在台灣廣泛布教⁵，此宗教在一九二〇年代以降成為世界語運動最有影響力的普及團體，其所發行的《人類愛善新聞》雜誌，印刷量曾高達百萬部，另也設置「エスペラント普及会」（世界語普及會）並發行《*Verda Mondo*》（綠世

美惠提及朱鋒自撰的〈莊松林年表〉中，曾記其將台灣童話〈慇虎〉以世界語翻譯並發表於《*La Verda Insulo*》第 2 年第 2 號。王美惠也對照〈慇虎〉手稿本（寫於 20 字 20 行、共 6 張的稿紙，未完成）與其發表在《台灣新文學》2 卷 3 號（1937 年 3 月），頁 73-78 的刊行本，發現用字稍有不同，刊行本較接近台灣話文，詳見王美惠，〈1930 年代台灣新文學作家的民間文學理念與實踐〉（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08 年），頁 215、220。戰後朱鋒重新發表漢文版時，標題與用字多有再修改，詳見朱鋒，〈慇虎〉，《台灣風物》21 卷 2 期（1971 年 5 月），頁 55-60。

⁴ 整個運動的發展，請參考拙論，〈日本統治下における台湾エスペラント運動研究〉（東京：一橋大学大学院言語社会研究科博士論文，2016 年）。

⁵ 鹿野政直，《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の底流 “土俗”的精神への回帰》（東京：NHK ブックス，1973 年），頁 76-77。

界)雜誌⁶。「台灣世界語大會」於1931年9月舉行,而後世界語普及會的成員便隨即展開為期半年的「全島綠化運動」。創刊於台南的《La Verda Insulo》(綠島),即是受到此綠化運動影響所刊行的世界語雜誌。

台灣學界對左翼的文化運動較為熟悉,但對於曾在日本殖民過的各個地方,包括滿蒙地區大舉宣教的「大本教」則非常陌生。筆者除了在博論中已進行初步考察,也在2019年前往位於日本京都綾部的大本教本部搜集史料⁷,希望對莊松林的世界語參與有更完整的掌握。以下,本論文將以莊松林的世界語實踐作為切點,並融合近年的考察成果,來分析一九三〇年代初期的日本與台灣社會背景之下,莊松林作為處於暗黑時期的一名地方性左翼青年,如何在參與普羅世界語運動與大本教的世界語普及運動中,找尋文化與文學的實踐方向,以及其中的意義。

二、「轉向」作為普羅世界語者的左翼青年莊松林

一九二〇年代後半到一九三〇年代初期,台灣各地雖仍殘存一些地方性的抵抗運動,但知識分子接連被檢舉或逮捕,台灣共產黨、台灣農民組合、台灣文化協會等組織幾乎全受殲滅⁸。尤其到一九三〇年代初期,無論是日本內地或殖民地台灣,可謂處於「轉向」⁹的時代。整個政治、經濟、社會即如當時的文化人葉榮鐘所言

⁶ 對馬路人,《〈人類愛善新聞〉解說》,收錄於中日新聞社監修,《人類愛善新聞 復刻版(別冊)》(東京:不二出版,2013年),頁5-7、26-27。

⁷ 2018年9月至2019年8月,筆者執行科技部計畫「以莊松林的世界語書寫及民間文學參與為考察對象」(107-2410-H-003-146-),於2019年2月前往日本京都綾部進行移地研究。其後也將初步考察以〈文化の面における1930年代台湾プロレタリア・エスペラント運動:民間文学者・莊松林を例として〉之題,發表於「日本台湾学会第21回學術大會」(福岡大學,2019年6月)。

⁸ 許世楷,《日本統治下の台湾:抵抗と弾圧》(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2年),頁369。

⁹ 「轉向」,作為一個時代之詞,它是一九三〇年代被司法當局製造出的詞彙,即當局脅迫共產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必須將自己的思想轉向認為「當局是正確的」。1933年,日本共產黨指導者佐野學與鍋山貞親在獄中被迫寫出〈共同被告同志に告ぐ書〉,聲明受蘇聯影響的共產主義運動乃為錯誤行為,而後,許多共產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也紛紛成為「轉向者」。所謂「轉向者」,一般包括:完全放棄原有立場而轉向對立面的人;一步步妥協,並企圖以倫理主義式的自我建構或某種獨特美學來獲得救贖的人;或者成為虛無主義者;或者思想不變,但是從原來的運動中徹底退出的人等等。「轉向」一詞,後來也逐漸成為放棄原有思想,而轉而信仰另一種思想的廣義解釋。參考鹿野政直,《日本近代の思想》(東京:岩波書店,2002年),頁174-176。

「八面碰壁」¹⁰的狀態。也如學者吳叡人所言，「1931年，是台灣民族運動從政治戰線全面撤退的關鍵」、「許多從政治戰場上撤退下來的民族運動者，將他們反抗殖民的能量與創意，轉移到幾乎被遺忘了的文化戰線上。」¹¹亦即，此時期的知識分子開始選擇新的文化運動，來實踐得以從政治壓抑解放出來的目標。而莊松林在世界語運動的努力，或可謂其「轉向」文化及文學運動時所選擇的場域與實踐。

1930年9月，莊松林即於台灣民眾黨的關係組織「赤崁勞働青年會」出版的《反普特刊》發表〈我們的反普運動〉；而同年10月，其即與林秋梧、盧丙丁、趙啟明等人創刊《赤道報》，但該報因左翼色彩濃厚而遭禁，11月的第2號與其後的第5號也被禁賣¹²。或許是雜誌遭禁賣所受到的挫折，莊松林於翌年的1931年成為世界語者¹³。而1931年的五一勞動節，赤道報社與「赤崁勞働青年會」及「台灣勞働者總聯盟台南支部」共同舉辦演講會，莊松林也以「五一節是國際勞働者一起來××的日子」為題進行演講¹⁴。

從這些社會運動上的實踐，即可清楚了解莊松林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與階級主張之立場¹⁵。莊松林與台灣世界語學會的主導者、且導致文協左傾與分裂的連溫卿，自一九二〇年代中後期以降就是勞工運動的同志，其成為世界語者，或也受連溫卿的影響不小。尤其自參加「赤崁勞働青年會」以來，莊松林被拘捕超過20次以上，謂若不盡快就職，恐將被移送火燒島，因此他成為鐵工廠職員，工作期間才開始投入世界語、新文學、民俗學等相關研究¹⁶。

¹⁰ 奇（葉榮鐘），〈發刊辭〉，《南音》第1號（1932年1月），頁1。

¹¹ 吳叡人，〈福爾摩沙意識型態——試論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民族運動「民族文化」論述的形成（1919-1937）〉，《新史學》17卷2期（2006年2月），頁175。

¹² 鄭喜夫，〈莊松林先生年譜〉，《台灣風物》25卷2期（1975年6月），頁11中將《赤道報》創刊時間誤植為1931年，應是1930年。可參考陳祈伍，〈激越與戰慄：台南地區的文化發展——以龍瑛宗、葉石濤、吳新榮、莊松林為例（1937-1949）〉（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論文，2011年），頁332。

¹³ 鄭喜夫，〈莊松林先生年譜〉，《台灣風物》25卷2期（1975年6月），頁11。

¹⁴ 朱子文，〈莊松林先生生平事蹟〉，《台南文化》新55期（2003年9月），頁13。

¹⁵ 正如鹿野政直於《日本近代の思想》中討論「社會主義的經驗」時，也提及論者多針對是否守住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思想信仰上之節操來評其「轉向」與「非轉向」，參考鹿野政直，《日本近代の思想》（東京：岩波書店，2002年），頁174-175。而就莊松林投入世界語運動前從事的社會運動與階級主張，以及其參與過的普羅世界語運動，即可看出其馬克思主義的思想。

¹⁶ 同註14，頁12-15。

深入參與社會運動的莊松林，其於 1932 年發行的《*Informo de F.E.S*》第 2 號中以署名「S. S.」發表〈エスペラントをかく視る〉，或可謂其社會運動的思想延續。而其投入世界語運動的關鍵時間點，應是 1932 年的第二屆台灣世界語大會之後；且此時他已站在普羅世界語運動所推廣的階級論之立場上來看待這個語言的普及。尤其當時世界語的學習在文化人之間也有一股潮流，包括農民運動者簡吉、李應章在獄中都仍不斷學習世界語。但作為一名居於台南的地方青年，莊松林更認真投入具「組織性」的世界語運動，應是在來台參加世界語大會的大本教「エスペラント普及會」理事廣瀨武夫，在大會後展開為期半年的「全島綠化運動」¹⁷之影響下，而加入王雨卿創立的「台南エスペラント会」（台南世界語會），而正式參與運動。

關於大本教與台南世界語會，將於下一節再討論；本節將針對莊松林作為「普羅世界語者」的意義進行分析。首先，「普羅世界語運動」的先聲，可溯自比嘉春潮（任職改造社，因世界語運動與連溫卿有交流）於 1927 年在東京成立的世界語者組織「柏木ロンド」（柏木研究會），該會中的階級論述漸漸在日本的世界語網絡中一連串的主張與討論，且很快地影響到台灣的部分世界語者選擇以普羅世界語運動的方向¹⁸。1931 年的第一屆「台灣世界語大會」之中，即設有「普羅世界語者分科會」；會後台灣世界語學會所發行的《*Informo de F.E.S*》，即是重要象徵。雜誌中也記錄了連溫卿在大會中的致辭：

向來是由有產階級所宣傳的這個語言運動，現在正由無產階級推展，使其更加發達；這代表，世界和平的追求，亦即在無需鬥爭的人類和平之追求上，無產階級絕不落後於有產階級。不，應該是說，真正的「無需鬥爭而能追求的人類和平」的這個工作，絕非是由有產階級所能完成的。¹⁹

¹⁷ 關於大本教的「エスペラント普及會」與廣瀨武夫的「全島綠化運動」，可參考拙論，〈日本統治下における台湾エスペラント運動研究〉（東京：一橋大学大学院言語社会研究科博士論文，2016 年），頁 47-108。

¹⁸ 同註 17，頁 109-138。

¹⁹ 連溫卿，〈我々は闘争なき人類の平和に生きん〉，《*Informo de F.E.S*》第 1 號（1931 年 12

這裡的有產階級，看似指包含在台日本人或台灣人資本家等有產階級，然而，正如連溫卿在〈一九二七年的台灣〉中，明確點出階級論述是為了「要讓台灣人得到解放」：

台灣的確有資本家，但尚未達到可獨立發展的地步。這是因為在台灣的日本資本主義已擁有鞏固地盤。而被壓迫、被榨取的台灣人，不僅僅是一些少數的資本家及地主而已，還有更大多數的勞工與農民。因此，要讓台灣人得到解放，就非得主張階級鬥爭不可。²⁰

連溫卿所謂的「無產階級」，乃指被壓迫被榨取的台灣人，包含少數的台人資本家或地主，更包括大多數的勞工與農民。而普羅世界語者所主張的階級鬥爭，其目的在讓所有被壓迫、被榨取的少數的資本家及地主，以及更大多數的勞工與農民都能得到解放。因此，包括普羅世界語運動的階級主張，也是為了讓「全體的台灣人」得到解放的方式之一。

另一較關鍵的時間點是，1932年3月與日本普羅文化連盟「コップ」(KOPF) 關連的運動家有400名以上遭逮捕，使得普羅文化運動面臨嚴酷考驗。也因此導致1931年成立的世界語全國性組織「PEU」(日本普羅世界語者同盟)的第2次大會無法成行，於是同盟提出了更具體的綱領草案²¹。此綱領草案的第一項即是：

月)，頁6(原文日文，筆者中譯)。完整譯文可參考拙論，〈《La Verda Ombro》、《La Formoso》，及其他戰前在台灣發行的世界語刊物〉，《臺灣文學史料集刊》第一輯(2011年10月)，頁71-74(附錄)。

²⁰ 連溫卿，〈一九二七年的台灣(節錄)〉，收錄於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吳密察解題，《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台北：南天書局，1995年)，頁203(原文日文，筆者中譯)。

²¹ PEU(普羅世界語同盟)在1932年3月提出的具體綱領草案為：「1.向勞工、農民及其他勤勞大眾宣傳普及世界語，2.參與世界語國際勞農通信運動，3.與反動的布爾喬亞世界語運動進行鬥爭，4.促進並提攜朝鮮、台灣、中國等其他東洋諸民族的普羅世界語運動，5.對統一並擴大國際普羅世界語運動的強化，6.與國際主義的教育啟蒙活動所推動的反動之排外主義進行鬥爭，7.確立作為國際語的世界語之發達及國際語理論，8.進行為了世界語實用所實行的普羅文化建設之鬥爭。」參考大島義夫、宮本正男，《反体制エスペラント運動史》(東京：三省堂，1974年)，頁178。另外，日本普羅文化連盟「コップ」(連盟名稱取自世界語名之簡稱：Federacio de Proletaj Kultur Organizoj Japanaj, KOPF)於1931年11月成立，參考藏原惟人，〈プロレタリア文学運動〉，收錄於藏原惟人編，《日本プロレタリア文学案内(1)》(京都：三一書房，1955年)，頁28-32。

「勞働者・農民その他の勤勞大眾へのエスペラントの宣伝普及」（向勞工、農民及其他的勤勞大眾從事世界語的宣傳普及）。

綱領公布後的同年 5 月，連溫卿以紀念台灣世界語運動 20 周年的名義出版《Elementa Leciono de Esperanto》（初級世界語教科書；台灣世界語學會教育部發行），此書可謂普羅世界語運動將在台灣落實的一大象徵。雖是語學教科書，但封面底色是象徵共產主義的紅色，而黑色的太陽底下則是 FORMOSO（台灣）的普羅階級並肩站立的繪圖，突顯了號召黑暗時代下的無產階級奮起鬥爭的意象。總之，這是台灣世界語學會為了實行「普羅世界語運動」所出版的語學書，也可謂連溫卿希望以世界語重新找到運動場域的實踐軌跡。



圖一 《Elementa Leciono de Esperanto》封面。

也正是在 1932 年 6 月的第二屆台灣世界語大會後，台灣世界語學會隨即發行《*Informo de F.E.S.*》第 2 號。由此通訊中刊載的馬克思主義相關思想文章來看，普羅世界語的主張尤其鮮明。另也刊載中村一雄的〈その後に来るもの〉²²（其後所來之物），文中即提及前述日本普羅世界語者同盟「PEU」的相關主張。循此脈絡，莊松林的「世界語」選擇，即有其作為台灣人的抵抗意識與尋求解放的目標之意涵。尤其他以「S.S.」在此發表的〈エスペラントをかく視る〉文中，除了從許多字成為禁忌的諱字，例如「国際的恐慌の深刻化から、いまや××××××の××に逼迫した今日に於いて、我々は一層エス語の必要を感ずる」（國際情勢的恐慌日趨嚴重，已是處於被××××××的××之現今，我們更加感受到世界語的必要性）²³等諱字標記，可知莊松林成為世界語者初時的立場之外，以下亦有一段深刻的呼籲：

²² 中村一雄，〈その後に来るもの〉，《*Informo de F.E.S.*》第 2 號（1932 年 6 月），頁 16-20。

²³ So-Šjo-Lin，〈La Malsaga Tigro〉，《*La Verda Insulo*》第 2 號（1934 年 7 月），頁 13。

普羅世界語運動，現今處於惡戰苦鬥的環境裡而持續壯大地發展。此發展決定在於小布爾喬亞階層，而是可以很明顯地在所有勤勞大眾與農村青年階層之中看到它的足跡。不消說，勤勞大眾與農民以及青年們，已經到達被迫從自己的環境學習所有，並從中欲求，且非學習不可的地步了。

(中略)換句話說，世界語是解放普羅階級解放的武器、人類和平之光。“**esprantismo**”(按：世界語主義)不也能在這個意識下開始準備著自身正當的發展嗎？也有很多“**gesinjoroj**”(按：大家、指世界語者們)只是一直在進行著社交性的、互相取暖的運動，但他們扭曲了世界語運動原來的使命，這樣根本無法橫向地擴展運動。因此，既是學習世界語了，我認為至少應該這樣去理解“**esprantismo**”。²⁴ (粗體：引用者)

此「勤勞大眾」，即指小布爾喬亞階層以外的一般農工勞動階級，完全反映前述「PEU」提出的綱領草案第一項「向勞工、農民及其他的勤勞大眾從事世界語的宣傳普及」中的具體目標。另外，引文中更批判將世界語作為慰安式、社交式的運動者們，認為其言行不符所謂的 *esprantismo* (世界語主義)²⁵，就內涵而言，可見其持有的普羅世界語者所認知的「世界語主義」之信念，此亦可謂莊松林的左翼思想承續在他的世界語思考。換句話說，對莊松林而言，成為世界語者並非僅是學習新的語言，而是具有透過運動去摸索一個新的社會實踐之意義。

而在 1931 年的第一屆台灣世界語大會舉行前夕，台灣有許多世界語團體相繼成立，包括「希望社世界語部」、「台灣學生世界語會」、「台灣女子學生世界語會」、「台灣大本教世界語部」等組織²⁶。大會之後，台灣世界語學會的通訊《*Informo de F.E.S.*》第 1 號，就對於下一節將討論的大本教世界語運動提出批判聲音：

²⁴ 同註 23，頁 13-14 (原文日文，筆者中譯)。

²⁵ 同註 23，頁 14。關於「*esprantismo* (世界語主義)」出現了左翼階級視野與右翼國族視野的爭論，請參考拙論，〈日本統治下における台湾エスプラント運動研究〉(東京：一橋大学大学院言語社会研究科博士論文，2016 年)，頁 177-210。

²⁶ 連溫卿，〈台湾に於けるエスプラント運動年代記〉，《*Informo de F.E.S.*》第 1 號 (1931 年 12

尤其大本的人們，因從宗教運動轉至新精神運動，而以唯心論的立場看待世界語，以這樣的語言觀為中心在大會中說出「語言是神所創造的」這種言論，這是應該要極力避免的。世界語是如何誕生、如何發展至今，這不是大家都最清楚的事嗎？世界語是柴門霍甫博士一開始就意識到人類社會需有它的必要性，且是在人類社會自始至終貫徹這個意識所發展而來的，根本和神沒有任何關係。這種事是世界語者從開始學習世界語時，任誰都知道的事啊！！

再者，分科會方面，這次設有普羅世界語者的分科會，這完全是正確的事。只有世界語有可能超越現今的階級，這是最理所當然的事。²⁷

台灣世界語學會的階級意識及馬克思主義對於唯心論的批判，事實上也可謂承襲了日本內地的普羅世界語運動²⁸。而也正因相信世界語為解放普羅階段的武器，在一連串的政治運動受挫之後，且接下來幾年也是世界語運動受壓抑的時代，莊松林仍摸索著如何以世界語運動，來達成其在文化實踐方面其思想的可能性。

1932年的莊松林發表〈エスペラントをかく視る〉，表明支持普羅世界語運動，但一方面，他也開始投入完全不同思想場域的世界語運動，即由「大本教」的「世界語普及會」所主導的世界語運動。運動思考或有不同，但在一九三〇年代初期，它卻提供台灣知識分子一個在黑暗時代下相對可行的文化實踐路線。而此契機應是1931年9月大本教「エスペラント普及会」的廣瀨武夫從京都來台參加第一屆台灣世界語大會之後所展開的「全島綠化運動」所影響。以下論之。

月)，頁15。台北エスペラント会編，《第一回台湾エスペラント大会プログラム》（台北：台北エスペラント会，1931年），頁1。武上耕一，〈台湾に於けるエスペラント運動に就て〉，《第一回台湾エスペラント大会プログラム》，頁29。

²⁷ 丘里宏，〈大会後に於ける青年ESP.ISTOの任務〉，《*Informo de F.E.S.*》第1號，（1931年12月），頁4-5（原文日文，筆者中譯）。

²⁸ 關於運動的階級主張與承襲日本內地的過程，或者關於「PEU」對於殖民地的思考及台灣方面對日本運動的建議與相互連動性等。請參考拙論，〈日本統治下における台湾エスペラント運動研究〉（東京：一橋大学大学院言語社会研究科博士論文，2016年），頁109-138。

三、透過與大本教世界語運動串連的文化策略

大本教在一九二〇年代與一九三〇年代都成為日本國內具極大影響力的新興宗教，在受到官方打壓後有了極大的思想轉變，除了出現附和國策及批判左翼階級的論述，也呈現具帝國主義式的國際主義思想，而如此面向也反映於其世界語普及運動。那麼，向來反抗當權且支持普羅世界語運動的莊松林，其以世界語寫就的台灣童話〈La Malsağa Tigro〉（躉虎），發表於與大本教相關的《La Verda Insulo》（綠島）雜誌，其意義更值得深究。

（一）大本教、「世界語普及會」與台灣「全島綠化運動」

大本教是日本所謂「創倡宗教」²⁹其中之一，其發祥於期待有大救世主得以拯救世界的時代，志在統合全世界的各宗教，並認為「萬教同根、萬教歸一」。來自美國的巴哈伊教（Bahá'í Faith）³⁰傳教士於1922年赴日本訪問大本教時，向第二代教主出口王仁三郎（1871-1948）提及巴哈伊教的信條之一：「世界的和平，將由世界語達成。各國國民除了使用各自的國語之外，應使用作為世界共通語的世界語。」此契機促成大本教決定以世界語作為教義之一並加以普及³¹。而後，大本教在日本全國各地實行「人類愛善運動」，且徹底推動具和平意義的世界語。

1919年11月為止，光從台灣前往位於京都的大本本部綾部參訪的信者，就高達一百數十人，同年，大本的修齋會便設立台南支部³²。剛開始是針對在台日

²⁹ 所謂創倡宗教（原日語漢字：創倡宗教），為幕府末期民眾期待從封建制度解放出來而由民間創生出來的一種思想，特別是指由一個創倡者所建立的宗教。包括伊藤六藏丸山教、黑住宗忠的黑住教、中山みきの天理教、川手文治郎的金光教也是此類，都是體現民眾希望「改造世界」（世直し）所產生的宗教；大本教正是在如此背景下誕生。1892年，生於京都府福知山、後成為住在綾部的孀孀之養女的56歲農婦出口なお（1837-1918），因得到「神示」而創立了「大本教」。可參考鹿野政直，《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の底流 “土俗”的精神への回帰》（東京：NHKブックス，1973年），頁27-28。對馬路人，〈《人類愛善新聞》解說〉，收錄於中日新聞社監修，《人類愛善新聞 復刻版（別冊）》（東京：不二出版，2013年），頁4。

³⁰ 巴哈伊教（Bahá'í Faith）為19世紀中期於伊朗所創立的宗教，目前仍有不少信者。官方網站：<http://www.bahai.org/>。

³¹ 藤代和成編，《大本えすべらんと史》（京都：大本エスベラント友の会，1986年），頁7-9。

³² 不著撰者，〈台灣と大本〉，《大本時報》，1919年11月16日，第7版。1919年11月的時間點在台灣設立的修齋支部僅於台南。不著撰者，〈大日本修齋會支部會合所一覽表〉，《大本時報号外》，1919年11月23日，第2版。12月以降，才開始在台北、台中、嘉義、台

本人布教，但 1920 年開始便在台灣全島宣教。勢力開始壯大後，卻被日本政府或台灣的總督府認為違反「國家神道」而遭受警戒，總督府在 1920 年 7 月開始禁止大本教在台灣的布教與書籍的發售³³。大本教在 1921 年遭受政府極大鎮壓的「第一次大本事件」後，即改稱「皇道大本」，後來所致力世界語普及運動在日本國內全力展開，且 1925 年 5 月在北京設「世界宗教連合會」，同年又在巴黎設「人類愛善會歐洲本部」，積極在國內外宣教³⁴。即便布教活動越來越受到打壓，王仁三郎仍以愛善運動之名，前往朝鮮、滿洲、蒙古、台灣等地布教³⁵。1931 年在台設立的「大本世界語研究會」，或許與王仁三郎來台有所關連。大本教的集會所，光是在日本時代的台灣，就高達兩百所以上³⁶。

關於大本教的精神與世界語的共通點，作為信徒的井上留五郎，將王仁三郎的解釋概括如下：

關於要使世界統一（道義性的）、神人合一的大御神業，最重要根本且終究必須要完成的，即是人心的統一。而人心的統一，首要條件則是在語言要達到共通的理解。在這方面，世界語確實是理想的、共通的中立語言，說詳細的話，它是為了我們的方針所預先準備的一個統一性的用語。這個語言大概是在 40 年前，即在大本教的開山始祖受聖靈附體之前被創造出來；不只是為了學習一種語言而已，是將其世界語主義作為根據，即「世界的人類都是神的孩子，都是同胞」這樣的博愛親和的精神，來期望達到世界的永久和平。³⁷

南、打狗（高雄）、阿猴（屏東）等地舉行較大規模的布教講演會。不著撰者，〈台灣入り〉，《大本時報》，1919 年 12 月 21 日，第 7-8 版。

³³ 同註 29，鹿野政直，《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の底流 “土俗”的精神への回帰》，頁 76-78。

³⁴ 出口王仁三郎言行錄刊行委員會編，《みろくの世—出口王仁三郎の世界—》（京都：天聲社，2005 年），頁 250-251。

³⁵ 出口王仁三郎曾於 1927、1931、1933、1935 年共 4 次為宣教來台。請參考出口王仁三郎官方辭典網站「出口王仁三郎と靈界物語の総合サイト」（來源：https://www.onisavulo.jp/modules/ond/index.php?content_id=154，2022 年 9 月 15 日）。

³⁶ 根據台灣世界語者卓照明氏（海洋大學退休教授）提供的資訊，2010 年前後有一位大本教的女性教徒訪台時拜訪卓氏，其提及日本時代在台灣設置的集會所就有 200 所以上；而 1929 年的時間點，大本教在全國各地就設置了 772 個支部。大本本部編，《天地和合 大本三代教主出口直日の生涯》（京都：天聲社，2015 年），頁 105。

³⁷ 井上留五郎編，《曉の鳥》（京都：天聲社，1925 年），頁 83-84。

亦即，世界語的思想被認為與大本教的教義是相通的，尤其王仁三郎自身也學習世界語，且認為「世界語主義與大本的精神相似」、「今後必需使用世界語」、「像現今這樣要了解世界各國的語言是非常困難的事，但使用世界共通語的世界語，僅 28 個文字即能通用於世界，因此研究這個語言，向世界宣示神的旨意，即是實現神意」³⁸。於是，「大本世界語研究會」即於 1923 年 6 月成立；而教團中也設置「エスペラント普及会」（世界語普及會），並於 1925 年發行機關雜誌《Verda Mondo》（綠世界）。

大本教於 1925 年創刊的《人類愛善新聞》，發行量曾高達一百萬部，足見勢力之大。而其中刊載的「人類愛善會則」裡，即明定「本會採用作為國際補助語的『世界語』」³⁹。雜誌中也開設世界語和日語羅馬字專欄，並刊載許多世界語相關論述文章。大本教在短期內，不僅成為日本國內最有力的宗教團體，更成為最大的世界語普及團體⁴⁰。

大本教也在 1931 年組成「昭和青年會」並發行《昭和》（後《昭和青年》）雜誌；稍後將述及的井上照月，即為青年會中心人物，曾來台參加台灣世界語大會，且在《La Verda Insulo》（綠島）發表過文章。其後大本教又組織「昭和神聖會」，勢力持續擴大，且因昭和青年會前往明治神宮參拜並高舉「國體闡明」之旗，種種行事被媒體大幅報導並指大本教為「愛國團體」⁴¹。總之，為了在不抵觸「國家神道」的原則下持續宣教並擴張勢力，大本教在 1930 年前後逐漸與國族主義、殖民主義加以接合。這樣的思想結合，也反映其世界語普及運動。即如韓國研究者尹智瑛觀察的，世界語運動自傳入日本之後，以思想運動、社會運動的方式被普及，許多世界語者是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這是自不待言之事。當然，尤其一九三〇年代從左翼轉向的人們當中，也有許多流為「大

³⁸ 藤代和成編，《大本えすぺらんと史》（京都：大本エスペラント友の会，1986 年），頁 14-17。

³⁹ 不著撰者，〈人類愛善會則〉，《人類愛善新聞》，1925 年 10 月 1 日，第 1 版。由於原件難以取得，本文引用《人類愛善新聞》之史料皆為復刻版，參考中日新聞社監修，《人類愛善新聞 復刻版》（東京：不二出版，2013 年），以下徵引不再另行標明。

⁴⁰ 對馬路人，〈《人類愛善新聞》解說〉，收錄於中日新聞社監修，《人類愛善新聞 復刻版（別冊）》（東京：不二出版，2013 年），頁 5-7、26-27。

⁴¹ 大本本部編，《天地和合 大本三代教主出口直日の生涯》（京都：天声社，2015 年），頁 106-107。

亞細亞主義」，或者也有在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侵略主義的潮流當中，與國族主義或國粹主義及亞細亞主義式的國際主義奇妙地黏合者⁴²。

也正是在這樣的思想逐漸轉換之背景下，「世界語普及會」的廣瀨武夫特地從京都來台參加台灣世界語大會；此前，他已以「綠化運動」的名義在日本各地進行世界語演講。來台後進行「台灣全島綠化」計畫，即於學校、醫院、青果同業組合、街役所等諸多公共機關舉辦講習會。受綠化運動影響，台北、台中、南投、嘉義、基隆、台南等地都設置支部⁴³。廣瀨在台灣巡講的聽講者，也曾發表相關文章刊載在「世界語普及會」的機關雜誌《Verda Mondo》。例如參加嘉義講習會的真耶穌教信者謝萬安，是曾在《台灣新民報》、《台灣文藝》中發表不少歌謠，並提倡台語羅馬字改革的文化人。其於 1932 年 5 月的《Verda Mondo》發表一篇世界語練習文，也在附加的短文中提及《人類愛善新聞》：

接著我用日語來說。我曾為了希望能擁有一些（按：世界語的）同志而做過不少努力，卻都沒什麼用。有一天，人類愛善新聞的橋本先生來家裡，因此認識了木暮德三先生，然後一起研究世界語。學習語言，的確需要許多努力，不能輕率。這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毅力。（中略）希望大家也能以這樣的心態來認真學習。一個像音樂這種具理想性，卻真的有所助益的語言，除了世界語之外，別無其他。我也試著研究過台灣話和希臘語，但文法總無法讓人熟練，還是世界語最好。幸好主辦單位能舉辦這麼有意義的講習會，在此向工作人員們致上深厚的謝意。⁴⁴

⁴² 尹智燦，〈1930 年代的日本のエスペラント運動と国際關係〉，《相關社会科学》第 19 號（2010 年 3 月），頁 73-88。另外，需補充說明的是，尹智燦觀察的是日本的運動狀況，一九二〇年代的世界語者的確有不少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台灣方面，倡議無政府主義並與世界語運動稍有連結者相當少數，就現有文獻來看僅有台灣出身的范本梁於 1924 年在廈門創刊的《新台灣》，封面即印有「La Nova Formoso」（新台灣）字樣。參考廣畑研二編，《大正アナキスト覚え帖》（東京：アナキズム文献センター，2013 年），頁 37。

⁴³ 由「エスペラント普及會」於京都發刊的《Verda Mondo》，自 1931 年 11 月以降就刊載不少關於台灣的世界語講習會相關新聞。

⁴⁴ 例如參加嘉義講習會的真耶穌教會信徒謝萬安，即在 1932 年 5 月的《Verda Mondo》發表世界語練習文與日語文章。廣瀨武夫，〈綠光はかゝやく〉，《Verda Mondo》第 8 年第 5 號（1932 年 5 月），頁 28（原文日文，筆者中譯）。

身為基督徒的謝萬安，與《人類愛善新聞》編輯者有所交情⁴⁵，且在「綠化運動」之前就對於大本教推動的世界語有所興趣；由此可知，像謝萬安這樣的文化人，其興趣在於世界語，而非大本教宗教本身；當然，或也因世界語的思想與大本教教義有所相通。這一點或許為莊松林的世界語實踐稍作註解，即其左翼的思想與對於人類和平的期望，在當時最可能的工具即是世界語。正如他也在 1930 年 10 月與佛教僧侶出身的社會運動家林秋梧共同創刊《赤道報》一樣，其目的不在於宗教，而在其左翼思想與社會運動。

（二）莊松林與「台南世界語會」的《La Verda Insulo》（綠島）

莊松林於 1934 年 7 月發表的台灣童話刊於《La Verda Insulo》（綠島）第 2 號。這份刊物是 1932 年 2 月以後參加「台灣全島綠化」講習會⁴⁶的博物學家王雨卿所成立的「台南エスぺラント会」（台南世界語會）於 1933 年創刊的雜誌⁴⁷，「台南世界語會」的前身是啟南綠友會，也曾發行同名的雜誌《La Verda Insulo》。「台灣全島綠化」開始於 1931 年秋天，在台南舉行講習會時的盛況，從該年 12 月於台南小學校舉行的講演會照片即可看出⁴⁸。而根據〈莊松林先生年譜〉所記，莊松林曾參加台南世界語講習會，且成為其會員。而莊松林成為世界語者雖與前述普羅世界語運動的思潮有關，但同為台南人的世界語者王雨卿，應對他有另一階段的影響。

被認為是「台灣生物研究先驅」的王雨卿（1907-1938），生於台南神農街。透過自習而通過日本文部省中等教員的檢定，當時，台灣人只有王雨卿和鄧火土（後來擔任台灣水產試驗所所長）2 人通過檢定⁴⁹。在台南師範學校博物教室

⁴⁵ 曾發行超過百萬部的《人類愛善新聞》，或許台灣的知識人並不陌生。張深切回憶錄中即提及《人類愛善新聞》分社社長賣問善兵衛也曾與民族運動領導者林獻堂有過磨擦之事。參考張深切著，陳芳明等編，《張深切全集 2 里程碑（下）》（台北：文經社，1998 年），頁 616。

⁴⁶ 廣瀨武夫，〈初試み集（台南の部）〉，《Verda Mondo》第 8 年第 4 號（1932 年 4 月），頁 14。

⁴⁷ 土師孝三郎，〈地方会機關誌批判〉，日本エスぺラント学会編，《エスぺラント年鑑（1934）》（東京：日本エスぺラント学会，1934 年），頁 99。

⁴⁸ 不著撰者，〈內地報道〉，《Verda Mondo》第 8 年第 3 號（1932 年 3 月），頁 19。

⁴⁹ 何耀坤，〈台南鄉土生物研究的先河——王雨卿先生〉，《台南文化》新 15 期（1983 年 6 月），頁 100。

擔任助教授的王雨卿曾與高島春雄編纂「日本產翼手目資料」，並發表於《台灣博物學會會報》，文章標題與作者名以日語及世界語標示⁵⁰。但這位曾致力於生物研究與世界語普及運動的優秀人才，卻因疾病而早逝⁵¹。

1934年11月的《Verda Mondo》(綠世界)便曾介紹過廣瀨武夫在台灣綠化運動期間獲得許多成果，其中在台日人重栖度哉(如右圖)成立普及會台南支部，並在1932年6月邀請王雨卿擔任地方講習會的講師；1933年《Verda Mondo》主筆再次來台時，兩人率先於台南再開講習會⁵²。

莊松林成為「台南世界語會」會員後，也成為中心人物，且在1934年12月16、19、21日的《臺灣新民報》〈大家起來慶祝柴門霍夫誕辰〉的文章，希望將世界語的理念介紹給台灣的知識圈。他的積極參與在《Verda Mondo》看得到不少記錄，例如他與王雨卿、重栖度哉等人聯名向《Verda Mondo》寄出新年祝電(下圖左)，而這份雜誌也刊出其台南世界語會舉辦的「柴門霍甫祭」活動(下圖中)。然而，一直到1935年年底大本教受到極大打壓之前，莊松林仍積極出席講習會(下圖右)。



圖二 王雨卿擔任講師紀錄

⁵⁰ 鄧慧恩，〈日治時期台灣知識份子對於「世界主義」的實踐：以基督教受容為中心〉(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論文，2011年)，頁222。王雨卿、高島春雄(Ou-U-Kijo kaj Haruo Takašima)，〈日本產翼手目資料(La Materialoj por Japanuja Kioptero (Chiroptera))〉，《台灣博物學會會報》28卷172號(1938年1月)，頁162-175。王雨卿的傳記小說也於2018年出版：鄧慧恩，《亮光的起點》(新北：印刻，2018年)。

⁵¹ 台南世界語會成員呂聰田曾寫王雨卿追悼文(附照片)刊於1938年9月的日本世界語學會機關誌。呂聰田，〈王雨卿君を惜む〉，《エスプラント(La Revuo Orienta)》第6年第9號(1938年9月)，頁32。

⁵² 不著撰者，〈緑の使徒は登場す〉，《Verda Mondo》第10年第11號(1934年11月)，頁23。



圖三 莊松林在台南世界語會的活動

- 左：〈祝電〉，《Verda Mondo》（綠世界），1935年1月。
 中：台南世界語會舉辦的「柴門霍甫祭」（中排左一為莊松林），《Verda Mondo》，1935年4月。
 右：「台南世界語講習會」，《Verda Mondo》，1935年10月。前列右三為王雨卿，後列右二為莊松林。品聽田為呂聰田之誤植。

而在《外事警察資料》中即可見於1937年4月及6月出版的《エスペラント運動の概況(上)・(下)》，此時期在日本全國還有諸多大大小小的世界語組織，而台灣的世界語組織則僅留存「台北エスペラント會」(會員25人)與台南王雨卿的「啟南綠友會」(會員10人)⁵³，這10人當中應包含莊松林。

即便大本教教主出口王仁三郎極力否認大本教的神聖運動並非所謂的政治運動，但它終因勢力的擴大而讓政府感到威脅性，而致1935年12月「第二次大本事件」發生，大本教被官方以其教理中具有變換國體的意圖與不敬罪等理由，其本部的建築物全面遭到毀滅，大本教被政府以企圖顛覆國體與不敬罪的嫌疑遭到起訴與全面大逮捕，截至1936年底遭到檢舉逮捕的信徒就高達987人⁵⁴；而其世界語普及會的機關刊物《Verda Mondo》也因此廢刊。直至日本戰敗前的10年間，大本教不再有任何活動，世界語的推廣當然也全數停止。除了政治方面的不安狀態，台南的世界語普及活動也因王雨卿病逝而停止。莊松林的世界語參與大致於1935年結束。

⁵³ 內務省警保局編，《外事警察資料第2卷(復刻版)》(東京：不二出版，1994年)，第17輯第28頁、第18輯第41頁。

⁵⁴ 出口王仁三郎言行錄刊行委員會編，《「みろくの世—出口王仁三郎の世界—」》(京都：天声社，2005年)，頁106、114。大本本部編，《天地和合 大本三代教主出口直日の生涯》(京都：天声社，2015年)，頁114、123。

筆者根據所掌握的文獻，整理出莊松林的世界語參與時間及內容如下表：

表一：莊松林的世界語相關參與

時間	莊松林的世界語相關參與
1931.07.12	莊松林年表中記此日參加「台南エスペラント講習會」。而其應是在參與文協與台灣勞工總聯盟時，即受連溫卿影響而接觸世界語。
1931.12	1931年9月，大本教「世界語普及會」理事廣瀨武夫來台參加第一屆台灣世界語大會，會後從事為期半年的「全島綠化運動」，在台灣各地推動世界語。原即曾學習世界語的莊松林，在此運動的台南講習會後，即加入「エスペラント普及会台南支部」。
1932.06.16	莊松林以世界語名縮寫 S. S.，於台灣世界語學會通信《 <i>Informo de F.E.S</i> 》第2號發表〈エスペラントをかく視る〉。
1933	王雨卿以「台南エスペラント会」（台南世界語會）之名創刊《 <i>La Verda Insulo</i> 》（綠島），此年應是莊松林最積極學習世界語之年。
1934.07	莊松林以世界語名 So-Ŝjo-Lin，於《 <i>La Verda Insulo</i> 》（綠島）第2號發表台灣童話〈 <i>La Malsaĝa Tigro</i> 〉（鱷虎）。
1935.01	莊松林與「台南エスペラント会」成員王雨卿、重栖度哉、余繩章、大野愛策、呂聰田聯名向大本教「エスペラント普及会」機關雜誌《 <i>Verda Mondo</i> 》（綠世界）寄出新年祝電。
1934.12.16、19、21	莊松林於《台灣新民報》連載〈大家起來慶祝柴門霍夫誕辰〉 ⁵⁵ 。
1935.03	莊松林幫忙籌備「台南エスペラント会」主辦的柴門霍甫主題活動、世界語展覽會。
1935.09	莊松林參加該年度「台南エスペラント会」第二回講習會（講師：王雨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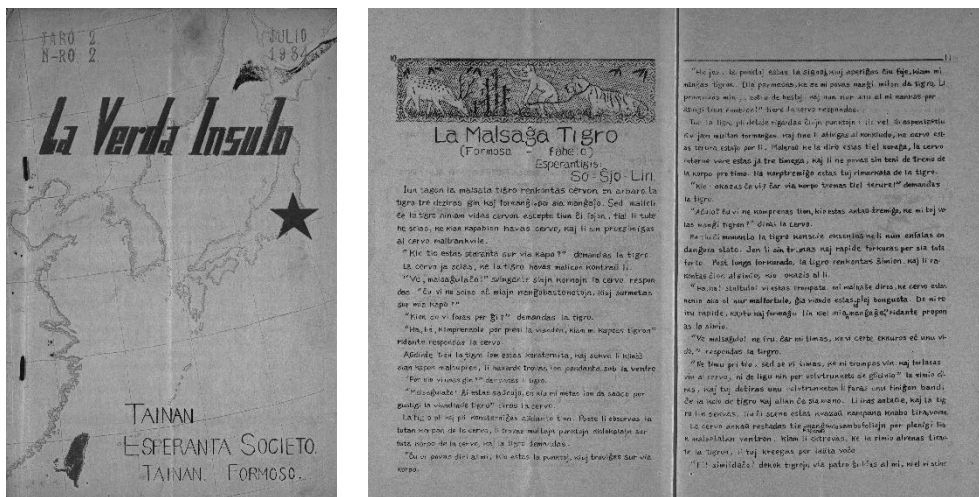
雖莊松林參與世界語運動大致僅在 1931 年至 1935 年之間，但其先在〈エスペラントをかく視る〉一文宣告作為普羅世界語者的立場，到將台灣童話〈*La Malsaĝa Tigro*〉（鱷虎）譯介給具「反抗性」與「跨域性」的世界語運動圈，過程深具意義。以下論析。

⁵⁵ 目前未見 1934 年之《台灣新民報》，〈大家起來慶祝柴門霍夫誕辰〉的刊載記錄。轉引自黃天橫編，〈莊松林先生著作目錄〉，《台灣風物》25 卷 2 期（1975 年 6 月），頁 34。

四、左翼與具跨域性的宗教思想的接合——莊松林的民間文學活動起點

莊松林真正投入台灣民間文學運動是在 1935 年前後⁵⁶，而其特別致力在民俗或語言研究則是在一九四〇年代《民俗臺灣》雜誌創刊之後⁵⁷。從前一節表格也可知，「台南エスペラント会（台南世界語會）」為莊松林主要參與的世界語組織；而其於 1934 年 7 月以世界語發表於《La Verda Insulo》（綠島）的台灣童話〈La Malsaĝa Tigro〉（鬚虎），可謂其民間文學作品的第一篇。

如前所述，大本教當時的世界語普及立場較傾向擁護國家勢力，對於普羅世界語運動多有批評。因此，莊松林參與的「台南世界語會」，雖是大本教相關團體影響下所成立，《La Verda Insulo》的內容仍耐人尋味。



圖四 《La Verda Insulo》上的〈La Malsaĝa Tigro〉（鬚虎）。

左：王雨卿創刊的《La Verda Insulo》（綠島）第 2 號封面，1934 年 7 月。

右：So-ŝjo-Lin（莊松林）〈La Malsaĝa Tigro〉（鬚虎）《La Verda Insulo》，1934 年 7 月。

⁵⁶ 朱子文，〈莊松林先生生平事蹟〉，《台南文化》新 55 期（2003 年 9 月），頁 10-13。

⁵⁷ 莊松林以筆名朱鋒在《民俗臺灣》發表〈臺南年中行事記（上、中、下）〉、〈語元とあて字（一～七）〉、〈臺灣神誕表（上、下）〉、〈水仙花〉、〈三日節と太陽公主〉……等多篇語言及民俗研究文章。詳細可參考註 55，頁 35。

此雜誌僅發行 2 期，現僅第 2 期出土，從雜誌的內容來看，其雖與大本教的世界語普及運動有密切關係，在思想的呈現卻也與「普羅世界語運動」有著類似立場。以下是第 2 期目次：

表二：《La Verda Insulo》第 2 期目次

原標題（依目次順序）	中譯	作者
Memprogresigo en Esperantujo	世界語界的自我發展	Hirose Takeo （廣瀨武夫）
誠と魂とを以て荊棘の道を拓け	以全誠及全神開拓荊棘之道	井上照月
類語 II	同義語 II	曄星（王雨卿）
La Malsaĝa Tigro	蠢虎（笨虎）	So-Ŝjo-Lin （莊松林）
想い出	回憶	落花屯虫
長崎に先輩を訪ね	至長崎拜訪前輩	大の生 （大野愛策）
Historio de Esp-Movado en Sovetio	蘇維埃的世界語運動史	古井仙一
エスペラントの真価を文通によりて知る	從通信了解世界語的價值	呂聰田
変換法に依る単語 暗記法（2）	依循轉換法則的單字 背誦法（2）	健忘生
La Leteroj al Redaktoro	致編輯的信	
編集後記	編輯後紀	曄星（王雨卿）

首先，投稿者中的 Hirose Takeo 即是展開「全島綠化運動」的廣瀨武夫，井上照月則是大本教的中堅青年，在《人類愛善新聞》中發表諸多宗教及世界語相關言論⁵⁸，兩人都是「世界語普及會」的重要幹部。而井上在 1932 年來台參加第

⁵⁸ 《人類愛善新聞》中刊載相關多井上照月的文章，例如〈外国に対して日本国民の自觉（上）〉，1929年6月2日，第4版；〈外国に対して日本国民の自觉（下）〉，1929年6月13日，第4版；〈些々たる感情から正しき理性へ〉，1929年8月13日，第4版；〈些々たる感情から正しき理性へ〉，1929年8月23日，第4版；〈刹那主義〉，1929年10月23日，第4版；〈質を忘れた自由平等論〉，1930年3月13日，第4版……等諸多思想性的文章；或者〈Bonulo kaj Malbonulo（善人と悪人）〉，1930年6月3日，第4版；〈エスペラント独習講座〉，1930年6月23日，第4版；〈エスペラント独習講座〉，1930年8月23日，第4版；〈Observu la naturon（自然を凝視せよ）〉，1931年5月13日，第4版……

2屆台灣世界語大會後，隨即在《Verda Mondo》（綠世界）中，大力批判會中台灣世界語學會的成員宣揚普羅世界語運動，認為他們不該在倡導和平的世界語大會中從事「赤化宣傳」⁵⁹。

但有趣的是，《La Verda Insulo》也刊出古井仙一從世界語譯為日語的〈Historio de Esp-Movado en Sovetio〉（蘇維埃的世界語運動史）⁶⁰，雖譯者在文章前言提及世界語運動近年的走向有所偏失，為了導正視聽與期待讀者看清運動的將來而翻譯此文⁶¹。但此文乃譯自普羅世界語者 Ernest Drezen 於 1931 年出版的《Analiza Historio de la Esperanto-Movado》（講解世界語運動史）中的一節。此書在 1931 年出版後，該年 9 月即有日譯版出版⁶²；譯者高木弘（大島義夫）為日本普羅世界語運動的重要推廣者，也是連溫卿熟識的世界語同志。日語版的出版時間即就在第一屆台灣世界語大會的 1931 年 9 月。因此，《La Verda Insulo》刊出此文，或也呈現編者對普羅世界語的包容性，甚至帶有支持此立場的意味。

那麼，莊松林發表於《La Verda Insulo》的〈La Malsaĝa Tigro〉，雖是目前可見其唯一一篇以世界語寫作的文章，卻也反映出其以文學實踐其普羅思想、介入文化與社會改革的意圖。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台灣話文論爭期間至 1934 年，而後即是台灣民間文學運動興盛之時，例如左翼雜誌更名自《先發部隊》的《第一線》即在第 2 期（更名後的第 1 期）刊出「民間故事特輯」，黃得時在〈卷頭言〉中即指出：「希臘神話已成為歐洲藝術最重要的材料之一」、「就是全世界所有的兒童，也常取牠當中的許多故事，以為童話的絕好材料」、「在歐洲對於民間文學的認識，很是徹底」、「我們應知道祖先傳來的遺產之民間文學的搜羅整理和研究，是我們後代人該做的義務之一啦！」⁶³這裡即將「民間文學」與「童話」直接連

等多篇世界語相關文章。

⁵⁹ 井上照月，〈第二回台灣エス大会感想記〉，《Verda Mondo》第 9 年第 1 號（1933 年 1 月），頁 21。

⁶⁰ 古井仙一譯，〈Historio de Esp-Movado en Sovetio〉（蘇維埃的世界語運動史），《La Verda Insulo》第 2 號（1934 年 7 月），頁 17-18。文末註有此文譯自《Analiza Historio de Esp-movado》（講解世界語運動史）。

⁶¹ 同註 60，頁 17。

⁶² エ・ドレーゼン著，高木弘譯，《エスペラント運動史》（東京：鐵塔書院，1931 年）。鐵塔書院當時出版許多普羅世界語相關書籍。

⁶³ 黃得時，〈卷頭言 民間文學的認識〉，《第一線》第 2 期（1935 年 1 月），頁 1。

結。那麼，莊松林的〈La Malsaça Tigro〉，其副標也以世界語標出「Formosa-fabelo」（台灣童話），則更有先驅性的意義。

〈La Malsaça Tigro〉的漢文版〈恣虎〉，後來亦發表於《台灣新文學》，發表時附於上方之標題即為「民間童話」。此前，莊松林已於《台灣新文學》發表另一篇民間童話〈鹿角還狗舅〉⁶⁴。戰後，莊松林將〈恣虎〉再以更貼近台灣話口語的白話文改寫為〈戇虎〉，與〈鹿角還狗舅〉重新發表於《台灣風物》⁶⁵，足見其對這兩篇民間童話的重視。尤其發表〈La Malsaça Tigro〉後，莊松林更加深入參與民間文學運動，除了在《台灣新文學》發表民間故事，也在李獻璋編著的《台灣民間文學集》中以筆名朱鋒發表的赤崁故事〈鴨母王〉、〈林投姊（按：姊）〉、〈賣鹽順仔〉、〈郭公侯〉等四篇⁶⁶。且在1940年代以降，其致力於民俗研究，於《民俗臺灣》中發表諸多關於習俗、語言等考文章⁶⁷，戰後也在《台南文化》發表許多民俗研究⁶⁸。循此脈絡，莊松林將源自台灣民間故事的〈戇虎〉，以具普羅世界語視野的實踐立場譯寫為〈La Malsaça Tigro〉，成為其民間文學創作之起點。

〈戇虎〉的主角是一隻餓虎，下山覓食不得，回程又遇到大雨，於是走入一民家後方的牛舍避雨。當時，牠聽到人們哀嘆著「毋驚雨，只驚漏」，卻誤聽為「毋驚虎，只驚漏」，而以為「漏」是一種很可怕的動物。剛好牛舍裡也躲著穿「棕蓑（tsang-sui）」的小偷，這隻戇虎慌忙之中被小偷身上的「棕蓑」刺得非常痛，以為那就是可怕的「漏」。回山裡後，虎把此事講給聰明的猿（猴）聽，猿馬上知道那根本是牠平時想吃、卻苦無勇氣和機會去吃的人類，於是建議和虎一同下山。平日狡滑的猿為取得虎的信任，提議用樹藤綁住雙方，成為生命共同體。怎知後來又遇小偷，小偷不小心從樹上跌下來壓到虎，虎受到驚嚇而趕緊逃跑，而猿就這樣被拖在後方，最後尾巴斷掉，身體已不知脫落何方。虎終於跑回山上

⁶⁴ 莊松林亦以進二之筆名於《台灣新文學》發表兩篇「民間童話」，一篇是〈鹿角還狗舅〉1卷5號（1936年6月），頁68-72，另一篇則是〈恣虎〉2卷3號（1937年3月），頁73-78。

⁶⁵ 〈鹿角還狗舅〉與〈恣虎〉於戰後同時重新發表。朱鋒，〈鹿角還狗舅〉、〈戇虎〉，《台灣風物》21卷2期（1971年5月），頁55-60（重刊時再修台灣話文用字為〈戇虎〉）。

⁶⁶ 李獻璋編著，《台灣民間文學集》（台北：台灣文藝協會，1936年）。

⁶⁷ 黃天橫編，〈莊松林先生著作目錄〉，《台灣風物》25卷2期（1975年6月），頁35。

⁶⁸ 莊松林於戰後發表的文章多收錄於葉瓊霞、蔡銘山等編，《文史薈刊》復刊第7輯（2005年6月）。

後才停步喘息。世界語版結局是虎咒罵猿為「騙子」；而漢文版最終，虎則為被「漏」吃掉的猿，流下如西北雨般的眼淚。

雖是源自台灣民間故事，但莊松林以世界語寫就，再以台灣話文改寫，戰後又重新發表，貫徹其文學與文化思考。一隻原充滿能量的野生動物，卻因智商不足無法獵物且受人所欺，最後只能悲傷逃離平陽。牠更無法發覺「敵人」的無用，而以為同伴也遭到敵手掠食，這可謂作者對愚民無法反抗的諷喻。

1935年12月，普羅文學家楊達創刊的《台灣新文學》雜誌，在封面亦印有世界語標題「La Formosa Nov-Literaturo」，莊松林也擔任營業部幹部⁶⁹；該誌曾連載2回連溫卿的〈エスペラント講座〉⁷⁰。雜誌中亦曾刊載「台灣童話」的徵稿訊息，謂法國的《國際文學》雜誌（按：應是世界語文學雜誌）計劃出版全世界各民族的童話，連溫卿可將作品譯為世界語去投稿⁷¹。而擔任《日本學藝新聞》台中支部代表者的楊達也在《日本學藝新聞》中介紹《台灣新文學》雜誌時，特別提及「關於法國《國際文學》編集者計劃刊行世界民族童話叢書，我們將會支持連溫卿氏參與介紹台灣童話的工作」⁷²。至今雖仍未能見連溫卿募集「台灣童話」並謂要刊登在法國的《國際文學》，但或許莊松林的〈La Malsağa Tigro〉，正是刊於《國際文學》的台灣童話其中一篇。

從一九二〇年代「台灣世界語學會」發行《La Verda Ombro》（綠蔭）以來，就陸續有世界語的文學作品在台灣被閱讀，甚且有台灣原住民傳說被譯為世界語⁷³；而到一九三〇年代由於左翼文化運動的影響，「世界語文學」更加被重視。例如1931年伊東三郎在《臺灣日日新報》即發表〈若々しく伸びゆくエスペラ

⁶⁹ 不著撰者，〈台灣新文學社大綱〉，《台灣新文學》1卷1號（1935年12月），未標頁數。

⁷⁰ 連溫卿，〈エスペラント講座I〉，《台灣新文學》1卷3號（1936年4月），頁98-100、〈エスペラント講座II〉，《台灣新文學》1卷4號（1936年5月），頁103-105。另外，1936年5月的日本世界語學會機關誌《La Revuo Orienta》也曾刊載《台灣新文學》標題印有「La Formosa Nov-Literaturo」的報導（頁30）。但也有人提出反對世界語的意見，如陳永邦，〈新文學四月號所感〉，《台灣新文學》1卷4號（1936年5月），頁40。翁闢，〈新文學五月號感言〉，《台灣新文學》1卷5號（1936年6月），頁44。

⁷¹ 連溫卿，〈台灣童話の國際的紹介に参加せよ！！〉，《台灣新文學》1卷9號（1936年11月），頁82。

⁷² 不著撰者，〈同人雜誌めぐり（六）台灣新文學〉，《日本學藝新聞》第16號，1936年11月15日，第5版。《日本學藝新聞》也附有世界語標題。

⁷³ 請參考拙論，〈關於連溫卿的〈台灣原住民傳說〉〉，《臺灣文學史料集刊》第3輯（2013年7月），頁97-121。

ント文學 それは何を語る？〉(蓬勃發展的世界語文學 這意味著什麼?)⁷⁴，且日本世界語運動之父小坂狷二出版了《エスペラント文学》(世界語文學)⁷⁵，亦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台灣話文論戰期間，無論支持派或反對派或多或少也都提及世界語或世界語文學，可見其在台灣的文學家或文化人當中並不陌生，乃因其所內含的追求人類平等或左翼的思想等緣故。

一九三〇年代中後期，世界語的消息也散見在文藝雜誌或相關討論。包括《台灣新文學》第2號也可見雜誌社收到來自日本鳥取縣米子市的「エスペラントの家」(世界語之家)寄來世界語刊物《月刊マーヨ》，而特地刊出的致謝詞⁷⁶。而1936年6月7日於東京新宿召開的「台灣文藝聯盟東京支部座談會」上，座長賴貴富在詢問早稻田大學的郭明昆關於語文改革的問題時，也提及羅馬字或世界語的可能性⁷⁷。這些小訊息，也說明當時部分的台灣左翼文化人對於世界語可作為一種媒介，將台灣的文化傳播至世界、與國際從事更多文化交流的認識。

由此背景重新檢視莊松林的世界語實踐，得知他是從含帶著馬克思主義的普羅世界語運動出發，而後連結由反對階級論的大本教世界語普及會影響下的世界語運動，從中找到自我的文化實踐位置。那麼，其往後致力於民間文學的書寫與民俗與研究，便有跡可循。無論是具「反體制」性格並主張團結勞農之階級運動的普羅世界語運動，或大本教為了實現人類和平的目標所從事的具「跨域性」意涵的世界語普及運動，對於台灣的文化人，尤其地方出身的莊松林而言，或許並不矛盾，乃因兩者間有其共通性，且能作為其在黑暗時代裡文化實踐的可能。

五、代結語：反體制與跨域性的世界語文學實踐

本論文考察民間文學作家莊松林於1931年至1935年之間，如何參與「普羅世界語運動」及新興宗教「大本教」的世界語普及運動之推廣，並以其世界語寫

⁷⁴ 伊東三郎，〈若々しく伸びゆくエスペラント文学 それは何を語る？〉，《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9月6日，第6版。

⁷⁵ 小坂狷二，《エスペラント文学》(東京：岩波書店，1933年)。

⁷⁶ 不著撰者，〈御寄贈深謝〉，《台灣新文學》1卷4號(1936年5月)，頁102。

⁷⁷ 不著撰者，〈臺灣文學當面の諸問題——文聯東京支部座談會〉，《台灣文藝》3卷7-8期(1936年8月)，頁9。

就的、且可謂是他第一篇民間文學作品的台灣童話〈*La Malsaça Tigro*〉(戇虎)為例,討論一九三〇年代的地方左翼青年於政治運動挫敗而「轉向」文化運動的摸索之時,為何選擇以世界語作為其文化實踐之道,以及其背後的可能意涵。

莊松林初成為世界語者時,乃以普羅世界語者的姿態投入運動,這是一個具「反體制」性格、希望連結所有無產階級的跨域性組織之運動。但處於「轉向」時期的暗黑時代,莊松林的實踐也須有所謀略,此時的新興宗教大本教,成為極有力的世界語普及團體,尤其大本教追求世界和平的目標,與反對殖民政策造成不平等待遇的知識人之思考有所契合,因此提供了作為一名地方性的左翼青年莊松林逐步摸索其社會實踐的新方式,即從「普羅世界語者」轉向參與僅以文化交流作為運動主體的大本教之世界語運動,來加以實踐其左翼思想。

即便在政治運動遭到壓制的一九三〇年代,普羅世界語運動不被官方允許,日本內地對大本教的打壓,也使得這個宗教以及其相關運動對台灣文化人的影響已相當有限,但這樣的世界語運動之嘗試與實踐,或可謂具有「反體制」性格的馬克思主義,與具「跨域性」並追求人類和平的宗教思想,在莊松林這位地方知識青年身上連結與複合的表徵。尤其從莊松林以世界語書寫的台灣民間童話來看,更可視為一位左翼知識青年,為了在文化及文學運動方面有所突破,而試著以「本土」之姿邁向「世界」的實踐過程。

參考書目

一、專書

- エ・ドレーゼン著，高木弘譯，《エスペラント運動史》（東京：鐵塔書院，1931年）。
- 大本本部編，《天地和合 大本三代教主出口直日の生涯》（京都：天声社，2015年）。
- 大島義夫、宮本正男，《反体制エスペラント運動史》（東京：三省堂，1974年）。
- 小坂狷二，《エスペラント文學》（東京：岩波書店，1933年）。
- 中日新聞社監修，《人類愛善新聞 復刻版》（東京：不二出版，2013年）。
- 中日新聞社監修，《人類愛善新聞 復刻版（別冊）》（東京：不二出版，2013年）。
- 井上留五郎編，《曉の鳥》（京都：天聲社，1925年）。
- 内務省警保局編，《外事警察資料第2卷（復刻版）》（東京：不二出版，1994年）。
- 日本エスペラント学会編，《エスペラント年鑑（1934）》（東京：日本エスペラント学会，1934年）。
- 出口王仁三郎言行録刊行委員会編，《みろくの世—出口王仁三郎の世界—》（京都：天声社，2005年）。
-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吳密察解題，《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台北：南天書局，1995年）。
- 台北エスペラント会編，《第一回台湾エスペラント大会プログラム》（台北：台北エスペラント会，1931年）。
- 李獻璋編著，《台灣民間文學集》（台北：台灣文藝協會，1936年）。
- 張深切著，陳芳明等編，《張深切全集 2 里程碑（下）》（台北：文經社，1998年）。
- 許世楷，《日本統治下の台湾：抵抗と弾圧》（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2年）。

鹿野政直，《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の底流 “土俗”的精神への回帰》（東京：NHK ブックス，1973年）。

鹿野政直，《日本近代の思想》（東京：岩波書店，2002年）。

葉瓊霞、蔡銘山等編，《文史薈刊 復刊第七輯 莊松林先生台南專輯》（台南：台南市文史協會，2005年）。

鄧慧恩，《亮光的起點》（新北：印刻，2018年）。

廣畑研二編著，《大正アナキスト覚え帖》（東京：アナキズム文献センター，2013年）。

蔵原惟人編，《日本プロレタリア文学案内（1）》（京都：三一書房，1955年）。

藤代和成編，《大本えすべらんと史》（京都：大本エスペラント友の会，1986年）。

二、論文

（一）期刊論文

尹智燦，〈1930年代の日本のエスペラント運動と国際関係〉，《相關社会科学》第19號（2010年3月），頁73-88。

何耀坤，〈台南郷土生物研究的先河——王雨卿先生〉，《台南文化》新15期（1983年6月），頁98-102。

吳叡人，〈福爾摩沙意識型態——試論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民族運動「民族文化」論述的形成（1919-1937）〉，《新史學》17卷2期（2006年2月），頁127-218。

呂美親，〈《La Verda Ombro》、《La Formoso》及其他戰前在台灣發行的世界語刊物〉，《臺灣文學史料集刊》第一輯（2011年10月），頁49-74。

呂美親，〈關於連溫卿的〈台灣原住民傳說〉〉，《臺灣文學史料集刊》第3輯（2013年7月），頁87-112。

(二) 學位論文

王美惠，〈1930年代台灣新文學作家的民間文學理念與實踐〉（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08年）。

呂美親，〈日本統治下における台湾エスペラント運動研究〉（東京：一橋大学大学院言語社会研究科博士論文，2016年）。

陳祈伍，〈激越與戰慄：台南地區的文化發展——以龍瑛宗、葉石濤、吳新榮、莊松林為例（1937-1949）〉（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論文，2011年）。

鄧慧恩，〈日治時期台灣知識份子對於「世界主義」的實踐：以基督教受容為中心〉（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論文，2011年）。

(三) 研討會論文

呂美親，〈文化の面における1930年代台湾プロレタリア・エスペラント運動：民間文学者・莊松林を例として〉，「日本台湾学会第21回学術大会」論文（福岡大學，2019年6月）。

三、雜誌文章

S. S.，〈エスペラントをかく視る〉，《*Informo de F.E.S.*》第2號（1932年6月），頁13-15。

So-Ŝjo-Lin，〈La Malsaĝa Tigro〉，《*La Verda Insulo*》第2號（1934年7月），頁10-12。

不著撰者，〈内地報道〉，《*Verda Mondo*》第8年第3號（1932年3月），頁18-20。

不著撰者，〈緑の使徒は登場す〉，《*Verda Mondo*》第10年第11號（1934年11月），頁23。

不著撰者，〈臺灣文學當面の諸問題——文聯東京支部座談會〉，《*台灣文藝*》3卷7-8期（1936年8月），頁2-10。

- 不著撰者，〈台灣新文學社大綱〉，《台灣新文學》1卷1號（1935年12月），未標頁數。
- 不著撰者，〈御寄贈深謝〉，《台灣新文學》1卷4號（1936年5月），頁102。
- 中村一雄，〈その後に来るもの〉，《*Informo de F.E.S.*》第2號（1932年6月），頁16-20。
- 井上照月，〈第二回台湾エス大会感想記〉，《*Verda Mondo*》第9年第1號（1933年1月），頁21。
- 王雨卿、高島春雄（Ou-U-Kijo kaj Haruo Takašima），〈日本産翼手目資料（*La Materialoj por Japanuja Kioptero (Chiroptera)*）〉，《台灣博物學會會報》28卷172號（1938年1月），頁162-175。
- 丘里宏，〈大会後に於ける青年 ESP.ISTO の任務〉，《*Informo de F.E.S.*》第1號，（1931年12月），頁4-5。
- 古井仙一譯，〈Historio de Esp-Movado en Sovetio〉（蘇維埃的世界語運動史），《*La Verda Insulo*》第2號（1934年7月），頁17-18。
- 朱子文，〈莊松林先生生平事蹟〉，《台南文化》新55期（2003年9月），頁9-18。
- 朱鋒，〈鹿角還狗舅〉，《台灣風物》21卷2期（1971年5月），頁50-54。
- 朱鋒，〈躉虎〉，《台灣風物》21卷2期（1971年5月），頁55-60。
- 呂聰田，〈王雨卿君を惜む〉，《*Esperanto (La Revuo Orienta)*》第6年第9號，1938年9月），頁32。
- 奇（葉榮鐘），〈發刊辭〉，《南音》第1號（1932年1月），頁1。
- 翁鬧，〈新文學五月號感言〉，《台灣新文學》1卷5號（1936年6月）頁43-44。
- 連溫卿，〈台湾に於けるエスペラント運動年代記〉，《*Informo de F.E.S.*》第1號（1931年12月），頁15。
- 連溫卿，〈我々は闘争なき人類の平和に生きん〉，《*Informo de F.E.S.*》第1號（1931年12月），頁6。
- 連溫卿，〈エスペラント講座 I〉，《台灣新文學》1卷3號（1936年4月），頁98-100。

連溫卿，〈エスペラント講座Ⅱ〉，《台灣新文學》1卷4號（1936年5月），頁103-105。

連溫卿，〈台灣童話の國際的紹介に参加せよ！！〉，《台灣新文學》1卷9號（1936年11月），頁82。

陳永邦，〈新文學四月號所感〉，《台灣新文學》1卷4號（1936年5月），頁38-41。

進二，〈鹿角還狗舅〉，《台灣新文學》1卷5號（1936年6月），頁68-72。

進二，〈恣虎〉，《台灣新文學》2卷3號（1937年3月），頁73-78。

黃天橫編，〈莊松林先生著作目錄〉，《台灣風物》25卷2期（1975年6月），頁34-45。

黃得時，〈卷頭言 民間文學的認識〉，《第一線》第2期（1935年1月），頁1。

廣瀨武夫，〈初試み集（台南の部）〉，《Verda Mondo》第8年第4號（1932年4月），頁14。

廣瀨武夫，〈緑光はかゞやく〉，《Verda Mondo》第8年第5號（1932年5月），頁28。

鄭喜夫，〈莊松林先生年譜〉，《台灣風物》25卷2期（1975年6月），頁5-33。

四、報紙文章

不著撰者，〈台湾と大本〉，《大本時報》，1919年11月16日，第7版。

不著撰者，〈大日本修齋会支部会合所一覽表〉，《大本時報号外》，1919年11月23日，第2版。

不著撰者，〈台湾入り〉，《大本時報》，1919年12月21日，第7-8版。

不著撰者，〈同人雜誌めぐり（六） 台灣新文學〉，《日本學藝新聞》第16號，1936年11月15日，第5版。

伊東三郎，〈若々しく伸びゆくエスペラント文學 それは何を語る？〉，《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9月6日，第6版。

五、電子媒體

The Bahá'í Faith 官方網站（來源：<http://www.bahai.org/>，2022 年 12 月 1 日）。

出口王仁三郎官方辭典網站（來源：https://www.onisavulo.jp/modules/ond/index.php?content_id=154，2022 年 9 月 15 日）。

